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一九四五年 以来的世界

〔法〕夏尔·佐尔格比伯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世界

〔法〕夏尔·佐尔格比伯 著

朱邦造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世界/(法)佐尔格比伯著;朱邦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1937-0

I. 一… II. ①佐… ②朱… III. 世界政治-概况 N.D
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990 号

我知道什么?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世界
〔法〕夏尔·佐尔格比伯 著
朱邦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37-0/D·156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73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4 1/2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8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绪论 未实现的和平(1945—1947).....	1
---------------------------	---

一 美国的民族风格.....	2
二 苏联理论与实践中的 国际主义和主权.....	7
三 战胜国的分裂	11

第一编 集团的诞生(1947—1962)

第一章 西方与遏制	20
-----------------	----

一 欧洲-大西洋政治共 同体的建设	23
二 在近东和远东进行遏制的 曲折历程	34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解冻”	41
-----------------------	----

一 社会主义阵营的动摇	44
-------------------	----

二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突破	52
第三章	学习共处?	60
一	第三世界:呼吁共处	63
二	两大国:共处的实践	70

第二编 确定性的终结(1962—1973)

第一章	联盟的危机	76
一	西方的危机	77
二	社会主义世界的危机	89
三	不结盟的暧昧性	94
第二章	从两极秩序到三角外交	99
一	欧洲的“妥协”	100
二	苏美对话	104
三	中国的重返	110

第三编 矛盾的上升(1973—.....)

第一章	跨国社会斗争	114
一	何种经济新秩序?	116
二	南北冲突抑或南西冲突?	121

第二章	新的“冷战”还是真正的缓和?	124
一	缓和还是“冷战”?	125
二	1973 年危机对东 西关系的影响	130
三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	133
注释		137
参考书目		139

绪论 未实现的和平

(1945—194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1945 年 5 月 6 日第三帝国投降而在欧洲结束,以同年 8 月 14 日日本投降而在远东结束。这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面冲突。所谓全面,是就双方所追逐的目标而言;对侵略者——纳粹德国及其卫星国或合作者——来说,其目标不只是征服敌方,而尤其是要从地球上把那些被集体潜意识最错乱的深层产生出来的理论贬为劣等的民族或种族消灭掉。对于同盟国来说,当战争局面改观后,战胜敌人就不够了,它们必须迫使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并用以民主原则为指导的立宪体制来取代敌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全面,还因为这场战争使用了历次技术革命予以更新的军事手段:空战早已使对抗超越了战场的范围,从而消弭了“前线”与“后方”的区别;而原子武器的出现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真正

的变迁。当原子弹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后,人类似乎看到了自身的灭亡。从此以后,在核武器的威胁下,人类将每天都处在“时间终结的前夜”。

在这危难的局势中,组织和平的责任主要由两个大国承担起来。托尔维克⁽¹⁾曾预言过这两个大国的兴起;而且,由于它们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政治统一、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似乎也只有这两个大国能对事态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两个大国便是美国 and 苏联。世界大战前厕身大国行列的其他五个国家,三个已战败:德国、意大利、日本;两个虽为战胜国,却已精疲力竭:英国和法国。事情的不合常理,在于两个新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它们是世界事务中心的“后来者”,它们各自对于世界的看法与传统的国际社会观很难吻合,因为,从诸多方面看,它们对世界都抱有“救世”观念,它们并不关心主权政治实体之间的均势,而自认为对世界共同体负有某种使命。

一 美国的民族风格

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受十八世纪哲学的教益匪浅。在他们看来,在一个经过改造并建立在理性

基础之上的世界里，对外政策和外交会失去其必要性；一个理想的国际社会的首要特征，恰恰在于它不复是国际的；新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外交的世界。

美国的“民族风格”从拒绝接受现存的国家间社会出发，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导致无为主义或行动主义。无为主义：当美国还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时，它闭关自守；它没有参加到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去，而是企图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不可避免地要与外界保持的关系之中；这时，它的基本“路线”是孤立主义，是中立。行动主义：跻身国际行为者行列后，美国就迫使别人接受它的把国内民主机制搬到国际舞台上来的观点和创造一种国际立宪秩序的意志；这时美国的基本目标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上重组世界，以避免战争。

这种行动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正酣时，随着威尔逊计划的提出而显露出来的。1916年5月27日，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他的和平计划，这项计划试图建立“反对任何自私的侵略的公理的至上权力”，并用“一种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签订的共同协定”取代“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旧式外交。一年后，当美国参战时，威尔逊在1917年4月2日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国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均势”，一种“为参战国眼前目标和利益服务”的和

平,而是要使一种“以对人类心灵与良知的呼唤的确切理解为基础的”新的国际法观念取得胜利。后来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与英国和法国的计划有很大区别,英法两国计划的中心,是建立一个强化传统的均势外交的欧洲安全同盟。

威尔逊的乌托邦空想,亦即按照国内社会的模式组织国际社会的理想,常常受到强烈的批判。弗洛伊德后来在对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美国政治家进行心理分析时,引用了威尔逊于1919年9月24日发表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是他充满激情地为维护凡尔赛和约而进行的活动的高潮。他说道:“这个条约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我敢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件,因为它标志着人类迄今为止相继出现的各种统治制度被彻底推翻了。”弗氏对此讥讽地评论道:“这是上帝通过圣子威尔逊馈赠给人类的条约。”然而,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这种对美国使命的纯洁性的关注,并非为威尔逊总统所独有,而是表达了美国集体行为的一种更广泛的趋势。美国的历史迫使美国同世界其他地区——首先是同美国的缔造者们所逃离的欧洲陷阱——保持道义上的疏远。由孤立,美国进而取得了世界的领导权。华盛顿总统要求他的同胞们保持的不苟同、不轻信的人格依然存在,尽管在这种品格中增添了些许怜悯的色彩。欧

洲，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世界，这个强权政治和均势权谋的中心，必然要激怒一个对实现进步、并最终实现和谐充满信心的社会，一个深受洛克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希望把美国历史上成功的手段——联邦政治结构和大商业市场——运用到国外去的社会。“威尔逊症候群”——如果有这种症候群的话——同产生于美国人民的文化、信仰和反应的美国“民族风格”恰相吻合，这种建立在将美国的经历理性化基础上的“民族风格”浸透了美国领导人的思想，影响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四分之一世纪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决意完成威尔逊的未竟事业。这位美国总统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位女助手称他为“充满精力和创造性的人”，乔治·凯南称他为“反常的凭兴趣工作的人”。但他显然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并无疑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国际主义者。他想要阻止英国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奉行为瓜分领土而签订秘密协定的政策；他希望保持战争期间同苏联建立的紧密联盟，并把苏联引上国际合作的道路；他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原则，并勾划出未来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轮廓。1941年8月26日，罗斯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纽芬兰相会后，共同拟订了“大西洋宪章草案”，该宪章历数了国际

关系方面的八项民主原则：签字双方不谋求任何领土扩张；非经有关国家人民自愿地表示同意，不得对领土作任何变更；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其政府形式；所有国家都应能够获得原料；所有国家都应作为经济、社会进步而进行合作；在摧毁纳粹主义后，所有国家将共同组织保障国际安全的和平；航海自由将得到确保；军备应全面裁减。1942年1月1日，在美英又一次最高级首脑会晤后，正在向德国和日本作战的各国签署了最初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联合国宣言”，签字各国承诺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与安全体制。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想法在1943年10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访问莫斯科时又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并在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于1943年11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得到了确认。从12月9日起，在华盛顿成立的一个小组又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罗斯福的政策就其长期抉择而言已勾划得十分明确；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未能处理战后初期的那些具体问题，而是将其推给将要成立的集体安全组织去解决；众多的误会正由此而产生。

然而，美国的传教热忱以及它希望传播的福音本身的优势——普世主义、平等主义、公理的统治等——恰可满足美国特殊利益的需要。崇高的道德愿望和自私的冲动相互作用，是非常符合人之常情的，

我们在美国的国际博弈中不可能不看到这种相互作用，因为国家是最高的效忠对象，民族骄傲是最高的价值体现。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初，其缔造者中就有一个人——如汉密尔顿——提出了现代政治现实主义的几项要素：国家之间的利益不会是自然和谐的；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具有和平的性质；主权政治实体的所作所为与那些贪婪的民族竭力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并无区别。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地理上的孤立和意识形态上的孤立主义，使其未能将理想的国际社会的观点放到国家间政治的现实中加以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护本民族的本能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今后，北美堡垒的安全有可能受到海外事变的威胁；珍珠港成了美国不安全的象征和灾难性的证明。在一个两极世界上，和平得以恢复，但很快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中立和不干涉的旧观念愈来愈迅速地受到侵蚀；美国很快就准备作出先前难以想像的政治和军事承诺。

二 苏联理论与实践中的 国际主义和主权

1917年，新生苏维埃俄国的最早的外交领导人制订了新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首先，这种意识

形态从许多方面看来都是灾难性的环境强加给苏维埃俄国的：年轻的国家不仅面临国内的严重困难，而且，从诞生之日起，便处在同德国交战的境地，并且很快就在几乎所有边界上同前沙皇俄国的盟国发生了冲突。因此，当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于 1917 年 12 月 16 日向欧洲劳动者发出呼吁，敦促他们要求停止战争时，他并不关心是否通过通常的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国际法和苏维埃国家的局势之间的矛盾顿时暴露无遗，因为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号召世界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起来进行革命。

实际上，除了当时的情况外，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还直接从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方法中受到了启迪。黑格尔曾试图将国家间的关系视同于受激情与利益驱动的人与人之间可能建立的关系。针对这种观点，马克思早在 1843 年就指出了消除任何主权国家特征的前景：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普遍性与各国主权的相互对立将被表明是互不相容的；作为普遍存在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将不构成特殊的国家。这种对国家消亡的预言，这种对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公民社会”的赞誉，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被认为是独立于所有主权国家的，并且有着与国籍无关的共同利益——诚然，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无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将进一步消除民族间的对立状态；1875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是对想要首先在“目前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拉萨尔和倍倍尔的信徒们的愤怒驳斥，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强调了工人运动的任何活动都具有直接的国际意义。或许，评论者可以在《宣言》中找到某些不甚确切之处：资产阶级国家的毁灭似乎应该伴之以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即使是为了把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中”也罢；或许，他们会指出，《宣言》的两位作者在1875年时产生了分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新形式，而更激进的恩格斯在写给倍倍尔的信中，则谴责“人民国家”的神话，并声言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因此当共产主义到来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消亡。这些不确之处和分歧之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试图通过《国家与革命》一书加以克服，他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国家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过渡阶段依然存在，但这时的国家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如此，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无论作为半国家、正在消亡的国家或负有普遍使命的无产阶级国家，都似乎涤除了传统的国家